

从“工业先行”到“优农发展”的战略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路向的选择与调整

王先明 徐 勇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天津 300350)

[摘要]如何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即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探索是已经获得全国胜利后建设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新任务。这个道路探索的艰难和曲折,完全超出了原先的预想。从1956年全面建设展开之后,毛泽东及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就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国发展的路线,适合于中国建设的道路。实践中形成的历史教训和历史经验,在反复的思考和比较中,很快获得理论的提升,从而完成了从“先工”到“优农”的战略转向。

[关键词]先行工业化;农业优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战略;转向

[作者简介]王先明(1957—),男,山西屯留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乡村史研究。

徐 勇(1984—),男,山东济宁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生,主攻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9)04-0037-06 [收稿日期]2019-01-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建设伊始,工业化建设就成为一个主导的方向。如何实现工业化,或者说如何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亦即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就成为已经赢得全国政权的中共领导层新的时代任务。道路探索的艰难和曲折,显然超过了原初的预想。尽管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曾反复提及这一困难(建设的“大跃进”,急速的人民公社化,以及各种建设指标的层层加码,都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对这一困难的整体认识的不足)。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方向问题,在全国胜利前夜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1948年9月8—13日)就集中讨论过,开始从思想认识上为走向建设的历史转折预作准备。在不久后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1949年3月5日)确定了“经济建设方针”^[1]^[P235],明确新中国建设的方向是使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

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会议报告指出,党必须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P1327]。

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力量虽然也以农民为主体,但中国革命的目标却是“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3]^[P158]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曾多次批评当时产生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①。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特别强调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1]^[P139]即主张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或小农经济可以建设起来的,而是必须依靠社会化大生产,首先是工业大生产来从事建设。早在1948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应将工业生产问题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有了工业生产的条件,党如果不注

^①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对农业社会主义提出批评,后来新华社在《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中又论述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意恢复及发展工业。党的领导人员如果缺乏工业方面的知识,如果不用力去学会这一方面的知识,那就会要犯错误。”^{[1] [P95]}因此,九月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向党的干部提出“关于学习工业和做生意”的任务,并主张“全党要提出这个任务来,还要写文章做宣传,在全党提倡学习工业和做生意。”因为“我们已有城市和广大地区,这个任务必须解决”^{[1] [P138]}。现代工业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也是新民主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这一建设思想,后来被高度凝练在“五四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4] [P251]}

1952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基本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社论,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大规模的建设即将开始”,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从革命转入建设的新时代。“我国前所未有的规模巨大的对于我国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某些复杂的现代化企业,将在今后逐渐地建设起来。”^{[5] [P428-433]}该社论还提出,今后几十年间的时代任务就是建设,“基本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工作中就被提到了首要的地位。我们能不能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首先要看我们是否能够保证基本建设的成功”^{[5] [P428]}。社论指出,这一建设步骤将决定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和速度。

随着1953年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设全面展开。“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而经济建设的目标或者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6] [P2]}。

既然“目前我们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那么,建设步骤亦须“分别轻重缓急,必须随着工业的发展逐步地进行”^{[7] [P411]}。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于1953年12月最后确定,并载入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8] [P216]}。这个“一化三改”、“一体两翼”(工业化是主体,两翼分别是指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总路线^{[7] [P2]}成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战略。

首先,“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工业化的中心是发展重工业。工业领导农业,城市领导乡村,工人领导农民,这是社会主义的确定不移的根本原则。”^{[9] [P782]}因此,“工业先行”的建设战略选择,决定了“积极工业化的政策”^{[10] [P407]}的全面实施。与此同时,以“优先发展以基础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和国防工业为代表的重工业,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国家的战略抉择”。以农业为代表的地区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优先产业、优先地区发展的需要,其实现途径“就是通过以农支工,人为地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以牺牲农业的代价实现了工业初步积累的快速完成”^[11]。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带来了空前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预期,中共高层在工业化建设上设定了“赶超”英国和美国的目标。毛泽东说:“十五年赶上英国,我看完全可能。十五年就看今年开始的这五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就看前三年,三年就看头年,头年就看头月。”^{[12] [P43 注1]}由此,全国各地上上下下的工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急速展开,“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形势”^{[12] [P67]}迅速到来。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其实仍是以群众动员方式开展的另一场革命:技术革命而已。“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12] [P51]}在这个历史大变动时期里,时代进步和发展带来艰巨的历史任务。

二

通过“大跃进”式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公社的制度创设,“全党全民办工业”,“乡乡社社办工业”的情势迅速形成,并以“一种新兴的生产力”^[13]面貌出现,不仅省、专区、县办工业,而且乡乡社社都在千方百计办工业,土制化肥厂、农具修配制造厂、砖瓦厂、石灰厂、煤矿、制糖厂、榨油厂、发电厂、铁厂

等中、小型企业如雨后春笋 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今年全国各地已经动工兴建的这些中、小型企业约八十多万个。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14] (P518)}

事实上,以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也是中国工业化“大跃进”的历史产物,或者二者如影相随,或者相伴而生。“乡社办工业对工业大跃进更有巨大的作用。全国二千多个县几万个乡,几十万个社,如果大家都动手办起工厂来,它有产品、产量,它的创造发明将是不可限量的。”它本质上是“‘全民办工业’这条方针”^{[14] (P520)}的体现。人民公社是工业化“大跃进”的一大支撑点,它是动员农村劳动力资源投入工业化进程的制度性要求,而大跃进作为快速工业化战略则内含了重工业优先的资源分配顺序。

然而,预期的目标(一、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二、加速农业机械化进程;三、加速缩小城乡差别进程)^{[14] (P520)}并没有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进程中得以实现,反而出现工农业产量急速下降和生产力衰退情势,众多工业建设项目“由于布点多,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到现在还没有建成一个”。实践证明,“缺乏充分根据的”^{[15] (P340)}“大跃进”式的工业建设不仅没有促成工业化的推进,反而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劳动生产率下降,产品质量降低,企业之间原有的协作关系很多被破坏了。”^{[15] (P614)}仅工业总产值一项在1961年就下降了40%多^{[16] (P21)}。而且,“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15] (P359)}。1959—1960年,全国16亿多亩耕地分别受灾几乎达15亿亩,以至于“1960年的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应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15] (P6)}。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受到极大影响,“许多地方日用工业品产量下降,供应紧张,甚至人民生活中每日不可缺的一些必需品和用具,如食盐、火柴、锅、盆、碗、筷之类,也买不到”^{[5] (P11)}。这一紧张局面的形成,恰恰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强势推进的两年期间^{[15] (P16)}。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当时曾以诗画般的宣传奇迹展开。毛泽东也开始反思“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17] (P436)}这

种“诗意化”建设行为,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不是头脑发热的诗情,而是按科学办事,尊重工业化建设规律和基础。毛泽东于1959年向全党干部提出,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任务。“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18] (P72)},更没有现成模式以资效法。

经验只能来源于实践,实践出真知。从1956年全面建设的展开之始,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就开始探索和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路线,适合当代中国建设的道路,其中包含着中国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理论思考。所谓工业化道路问题,其实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专门就此强调说“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注意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7] (P240—241)}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号召党的领导层一方面要读书,一方面要调查研究。“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而教训特别是惨痛、深刻的教训可以结晶为具有引导未来的思想。“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很有帮助,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就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18] (P231)}

大跃进的“赶超”式目标发展教训极其深刻。这一阶段是由国家以计划经济手段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是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化阶段。但这一阶段需要农业提供原始积累,需要农产品的保障供给,需要农业合作化和农民的组织起来,以切断资本和农村的联系。而这种靠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劳动积累,既支持着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又极大地改造了中国农业落后的传统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很显然,在这一历史阶段,或国家工业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之前、在农业的粮食保障等问题基本解决之前,是不可能过早地推进农村的工业化进程,或过快地大量转移农民进入城市的。1958年大跃进以后陷入的经济困难,实际上就是这种比例关系破坏的结果。

毛泽东总结,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从1953年起,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在于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为国家的工业化建立基础,并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稳步增长。”^{[19] (P219 注3)}三年连续大跃进产生

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这促使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在广泛调查研究之后,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处理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的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15] P27)},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合理运行。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的“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安排经济生活”^{[15] P28)}①的意见,于1961年开始得以贯彻和落实。

在“工业化先行”或者“以重工业为中心”发展的战略引导下,“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其重中之中是重工业的生产,虽然不能放松生活资料生产本身,但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粮食生产,首先是一个“养活工人”保障生产资料生产的问题。“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18] P80)}对于当时学习和推广苏联建设模式的经验及教训,毛泽东提出,要吸取苏联或东欧教训,总结和发现带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规律。“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统计局的材料,说我国日用品销于农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实行工农并举,这怎么能行?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工农并举,到现在已经四年了,真正实行是在一九六〇年。”“从一九六〇年起,我们要增加农业所需要的钢材。”^{[18] P121、124)}

在1959年和1960年反复碰钉子、遇阻之后,中央领导层开始更多地反思和总结经验及教训,同时也形成了更多不同认识和思想上的碰撞,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的‘第二次结合’”^{[20] P245)}。

三

“优农”建设(即优先发展和建设农业)的思想,毛泽东在1950年代末的《论十大关系》中曾有所提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

轻工业”^{[17] P24)},但在当时中央并没有形成一个思路确定、相对完整的决策。在遭遇1960年代初重大挫折后,中央领导层才在反复讨论和研究中得以形成相对共识。“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什么叫不造反,就是要使人们过得舒服,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积累”^{[21] P143)}。毛泽东开始从国家建设战略高度提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农业关系到人民的吃饭问题,即基本生存问题。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既是轻工业原料主要来源、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当时,农产品是中国重要出口资源和工业化建设所需的外汇重要依赖,农业是国家积累的重要来源和国家工业化建设和发展的根基所在。因此毛泽东曾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但当时还没有形成“优农”建设思想,只是提出两手抓,即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并要求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业,支援农业。到1959年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22] P962—963、[20] P285)}至此,“优农”建设思想开始形成。“毛泽东在1959年首次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但是直到1960年秋季才实施。”^{[23] P339)}进而,中央开始提出“‘吃饭第一’的方针”^{[15] P61)}。等到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才正式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确定为国民经济建设的总方针。

建设战略上的“优农”思想及其方针,强调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在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战略规划下,优先保证农业发展和农田水利建设的投资。毛泽东特别指出“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多

①随后,李富春这个报告中说“经过三年的伟大实践,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同志这个观点的正确性。”^{[15] P30)}。

积累……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18] [P241-78]}显然,至此“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15] [P85]}在一定意义上取代了 1958 年提出的“全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

“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24] [P137]},即农业发展优先思想及其方针,实际上是面对国民经济建设困境和不利局面而被倒逼出来的。正如当时《人民日报》社论所概括的,在调整思路后,把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转变为“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交通部门的工作和整个经济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24] [P137]}。这一特点,体现在陈云所作《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中,“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事实上成为当时的重中之重;而“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25] [P736-738]、[26] [P262]}则是这“重中之重”任务得以缓解和解决的前提条件。因而,陈云代表中央所提出的“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思想,就成为 1960 年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方略。“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在一九六二年逐步转向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27] [P2]}而且明确提出,工业部门应当“把支援农业、支援集体经济放在第一位”^{[27] [P37]}。

“优农”思想及其方针提出后,国家建设计划一定程度上向农业部门倾斜,一方面,“我们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全力支援,从水利、机械、化肥、劳动力、供应各方面来支援农业”^{[15] [P243]};另一方面,“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26] [P261]}。因此,在 1961 年国家基本建设计划中突出地提出,“首先是根据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支援农业放在第一位”^{[15] [P260]}。至此,在国民经济计划实施上开始作重大调整,而调整的中心内容即是“要先安排农业的需要,其次安排轻工业和手工业的需要,然后安排重工业的需要”^{[15] [P718]}。国家对农业扶持力度随之逐步加大,从 1957 年到 1978 年,国家对农业投资占全部国家投资的百分比从 7.8% 上升至 12.5%,对农业工业投入品生产的投资占全部国家中工业投资的百分比从 3.0% 增至 11.1%,而农业税占全部国家收入的百分比从 9.6% 下降至 2.5%。农

业与工业产品的交易价格比也逐步向有利于农业的方向改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开始逐步缩小。由于“动员和集中了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力方面,积极地支援了农业”,至 1965 年,工农业生产均实现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粮食产量 3891 亿斤,基本恢复到 1957 年水平。钢、煤、化肥产量均有大幅增长。国民经济经过五年调整,已经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直到 1965 年新的一年到来时,《人民日报》社论仍然突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要求集中优势力量,有计划地进行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认为“这是我国人民当前最重要的建设任务”^{[28] [P2]}。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18] [P106]}1963 年,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中对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表述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4] [P137-138]}1964 年 12 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中,也将农业现代化置于首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乡村建设思想或战略,既是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成为国家整体建设的前位^{[20] [P270]}。“优农”思想或战略构想已经出现,这是国家建设面临重大挫折后的一个历史性调整。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国家建设方向,但在具体发展的战略规划上或者说道路选择上,一直实施的是“先工战略”:即先行发展和建设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目标。1954 年最早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表述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工业现代化置于“四个现代化”之首,这是整个 1950 年代国家建设战略构想的基本路线。显然,“优农”思想体现的是国家建设战略路线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它被高度凝练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的总方针”。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刘少奇自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
-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8]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 [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1]薛蒙林.剖析“三农”问题的历史逻辑[J].社会科学研究,2013(2).
-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13]天津市五金交电公司.关于帮助社街工业健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成本核算工作的汇报(初稿)[Z].X85-Y-76-59 天津档案馆藏.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工作的文件材料(196405-196408),X0053-C-1996.
- [14]邓子恢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8]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20]沙健孙.毛泽东与新中国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21]丛进.1949—1976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2]毛泽东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23]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2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2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 [2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2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Strategic Shift from “Industry First” to “Agriculture First”

——Select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Direc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NG Xian-ming, XU Yong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How to realize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is a new task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build a new China after 1949. Since the launching of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in 1956, Mao Zedong and the main leaders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ad begun to explore a road suitable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The historical lessons and experience formed in practice, in repeated thinking and comparison, quickly improved the theory, thus completing the strategic shift from “Industry First” to “Agriculture First”.

Key Words: Industry First; Agriculture First; construction direc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ift

[责任编辑、校对:把增强]